



FAZHAN DE DAIJIA

发展的代价

文化篇

汤文菲 柴艳萍 王增奎 著

新华出版社



发展的代价

文化篇

汤文菲 柴艳萍 王增奎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代价/汤文菲, 柴艳萍, 王增奎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1-5534-8

I. 发… II. ①汤…②柴…③王… III. 社会发展—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615 号

发展的代价

汤文菲 柴艳萍 王增奎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源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石家庄市机场路小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635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534-8/Z·661 定价: 75.00 元

卷首语：代价——必要的丧失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类文明是在不断同自然、同社会、同人类自身的对抗中发展的。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征服自然、塑造文明的每一步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用鲜血换取和平，用生命换取财富，用艰辛换取科技的进步，用不竭的努力换取文化的繁荣……人类付出的这一切，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而言，都属于正常的支出，这种丧失不仅必要而且必然。

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充满睿智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然而，由于人类自身的幼稚和认识上的偏差，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成就与失误总是如影相随、相伴而生的。这种失误通常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舍简求繁，走许多弯路，找不到捷径，致使付出许多无谓的代价。二是适得其反，就像人们常说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结果却背道

而驰。三是误入歧途，人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进步，却被误用在不当的领域，人为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这些情形，在人类文明史上时有发生，不胜枚举。

任何一种失误，最终结果都会导致代价无限增大。上学缴纳必要的学费，行路支付必需的交通费，就餐需要买单，观赏风景、观看演出需要购买门票，这些付出是正常的。如果连这些正常的支出都节约掉，那么不仅吝啬，而且也由此放弃了发展的权力。相对于结果而言，代价的付出有大有小。付出很大代价却换不回相应的结果，那么这个代价就是无谓的；付出一定代价取得相应的成就，那么这个代价就是必需的；付出较小代价取得双倍的成效，那么这个代价就是最佳的。以上三种情况，第二种是正常的，也是最为常见的。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特殊的，只不过前者造成了较大失误，后者创造了较大成就。面对代价，多数人的评判标准是只重结果。对结果满意，往往就忽略了代价；结果不够理想，往往会夸大代价。这看似无可厚非，其实却极为偏颇。有一些代价，就一定历史阶段而言是无谓的，但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却是极其必要的。代价意味着丧失，但必要的丧失总是裹藏着进步的动力。

代价的付出，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观念。观念的进步与落后，往往决定了评判代价的态度，决定了敢不敢付

出,敢不敢发展。当富足地区的人们支付上千元去观看一场明星们的精彩演出时,贫困地区的人们正在为花一元钱而盘算今后的生计;当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几十亿资金改善自己的生态环境之际,发展中国家却正为赚取区区外汇而滥采滥伐。观念决定了人的生命轨迹,观念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发达地区不惜斥巨资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落后地区却在为适龄儿童不能上学、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而苦恼。文化产品已成为富有者必备的精神享受,贫困人群却终日为生计所迫而不知艺术为何物。知识产权早已成为文明国度重点保护的对象,许多落后地区的盗版、抄袭现象却屡禁不止。观念上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症结。我们目前迫切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回溯以往的历程,由于观念落后,我们曾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误。检讨自身的历史,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人类,最大的失误、最大的教训、最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观念往往不能同文明进化同步,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

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早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其间的著作汗牛充栋,层出不穷。这些著作大多从正面立题,历数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几乎涉及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发展的代价》,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著作中虽然稍显孱弱,但它也

具有些许独特的魅力。其一,从反面立题,以人类的失误作为探讨内容,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其二,从失误和教训谈起,探析代价付出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沉重而深刻的话题。其三,追根溯源,展示危机,向人类亮出黄牌,发出警告,这无疑是一项富有现实和深远意义的工作。

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失误,这是现代人理应拥有的最佳观念,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与依据。这部《发展的代价》,正是本着这一初衷著述的。这部书的创意是在1999年中秋时节提出的,在将近三年的著述过程中,著者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新华出版社的阎秋华同志,为本书的著述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借此深致谢忱。

著 者

2002年7月于石家庄

目 录

1. 尘封典籍
——禁书现象面面观 (1)
2. 焚毁书香
——关于中国古代焚书的思考 (10)
3. 祸出笔端
——话说古代文字狱 (16)
4. 遗产和遗憾
——兼论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对策 (21)
5. 译者的悲哀
——从林纾译《茶花女》说起 (28)
6. 以讹传讹
——是文学扰乱了历史吗 (36)
7. 词不达意
——从一起经济官司说起 (45)
8. 血与火的洗礼
——评战争对文化的影响 (51)
9. 文与史的错位
——浅议陈世美的悲剧 (58)
10. 手民之误
——由笛福的笔误说开去 (64)
11. 文化误读
——戏说杜甫的无奈 (70)
12. 挥霍智商
——话说古今文字游戏 (79)

-
13. 陈词滥调
——从今人的习惯语说起 (85)
14. 失真的圆满
——关于中国古代作品“大团圆”结局的思索 (91)
15. 颂扬升平
——浅论古代文人的品格 (98)
16. 悲情女性
——浅议中国古代女性题材作品的缺憾 (105)
17. 文人作伪
——文化赝品的由来 (113)
18. 文人相轻
——由周汝昌续《琵琶行传奇》说起 (120)
19. 盗亦有道
——文学作品的美化功能 (129)
20. 口诛笔伐
——文学作品的丑化功能 (137)
21. 捧杀与棒杀
——兼评鲁迅的文学批评观 (144)
22. 恨乌及屋
——如何评价反派人物的艺术品 (152)
23. 网络忧思
——关于网络文化负面影响的思索 (159)
24. 哭泣的母牛
——浅论艺术家的风骨 (166)
25. 文化克隆术
——从叶蔚林涉嫌抄袭谈起 (173)
26. 狗尾续貂
——从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谈起 (180)

-
27. 文化寄生
——盗版现象面面观····· (186)
28. 喧嚣与骚动
——浅议文化研究中的浮躁现象····· (193)
29. 让女娲走开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200)
30. 消闲的艺术
——浅议武侠、言情作品的泛滥····· (207)
31. 偏爱与偏见
——浅谈艺术欣赏中的审美差异····· (214)
32. 皇帝的新衣
——文化炒作与包装····· (221)
33. 信而好古
——关于文人慕古心态的分析····· (228)
34. 一字千金
——浅议文人的名利观····· (234)
35. 感情的放债
——浅评中国古代的宽容心态····· (240)
36. 为他人做嫁衣
——关于古今代笔现象的思考····· (246)

1. 尘封典籍

——禁书现象面面观

书是人的灵魂。当人的形体消失，思想被保存下来，这就是书籍。

书籍，犹如负载了人类智慧的一艘艘航船，穿越时光的海洋，把前人珍贵的精神遗产赠送给一代又一代人。于是，人类剔除失误，享用成果，登上一个个新台阶。如果没有书籍，人类会蹈袭在混沌的跋涉中，世界也会失去绚丽的色彩。然而，尽管这精灵一直被人类视若掌上明珠，但有时也难逃厄运，被深深囚入历史的黑色隧道里。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种与文明进化如影相随的可悲现象，那就是禁书。

当然，书籍在记录人类文明进化的同时，其中也难免夹杂着一些精神垃圾和糟粕，如妖言蛊惑、宣扬迷信、诲淫诲盗之书等。它们就像健康肌体里的毒瘤，如果不及时清除，必然会导致整个肌体的溃烂。这样的书理当封禁，甚至销毁灭绝也不足惜。可悲的是，中国历朝历代进行的禁书活动，矛头指向的并不是这些文化垃圾和糟粕，而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歌德曾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宋文化）有过高度评价，他说：“当中国文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而欧洲人还在原始森林（指黑暗的中世纪）徘徊。”中国人历来以“文明古国”、“文化悠久”而引为自豪和骄傲。然而，当欧洲古罗马社会继承古希腊文化，在摹仿中形成了为文艺复兴所推崇的古罗马文化

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西北一隅的秦国，却沉重地拉开了禁书的序幕。

欧洲也曾有过禁书的经历，但它大约始于中世纪，至少要比我们晚 800 年。中国的文化史上，从充满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开始，随着朝代的更替，禁书范围逐步扩大，到清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图书所遭遇的旷世浩劫，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及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不幸，也是隐藏在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背后的一道浓重的阴影。

春秋战国，各方诸侯群起争霸；儒、法、道、墨，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此时，形成了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是，璀璨的文化星空飘出了禁书的乌云。僻居西北、国力和文化水准都不及中原的秦国，不论是年轻有为的秦孝公，还是叱咤风云的秦始皇，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青睐投向严酷的法家理论。在法家理论的误导下，先是商鞅变法，“燔《诗》、《书》”；随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韩非子》一书中一再强调，放任文化事业的发展必将导致国家政治的衰败，保证独裁统治最根本的就是推行愚民政策。韩非一生虽未被重用，最终被同窗李斯害死，但他那套“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的禁书理论，经秦始皇、李斯等人的倡导而首次付诸实践。《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吕氏春秋》、《山海经》、《孙子》等，许多优秀文化经典都被列入封禁的行列。由此可见，韩非的一家之言，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灾难是无比巨大的。尤为可怕的是，这种灾难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几何倍数增长。

被秦孝公看重、令秦始皇着迷的法家理论，从实质上说是非常幼稚的，而将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非常草率的。因为在这个幼稚的理论中包含的是残酷和野蛮。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禁书，给我们的文化留下了永久的痛楚和伤痕：禁毁六国史书，造

成了先秦历史的模糊；儒家经典的遗失，导致学术界的今文古文之争，致使后代学者毕其功来考证真伪；更严重的是，它阻碍了中国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极心态。这些也许是韩非、商鞅等所始料不及的吧。令人困惑的是，秦始皇下令禁毁的书籍，在后世竟然广泛流传，被严加禁锢的儒家经典在汉武帝时竟成为独尊的对象；倒是被他保留的卜筮、种树、医药等实用性图书，在后世却几乎绝迹。难道说历史在和秦始皇们开玩笑吗？而在同时代的古希腊雅典，执政的民主派同样也是出于强国的目的，却采取了笼络政策。他们将最富群众性的酒神祭祀活动引入雅典文化中，大力提倡，建造剧场，举办盛大比赛，希腊戏剧空前繁荣，成为民主力量表达理想和教育公民的工具。

汉、唐时期，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相对较为宽松。这无疑是对秦代酷烈文化政策的一种低调反拨。但其间的禁书活动并未停止，严禁私藏天文、讖纬图书，则是中国禁书史上的一个创举。如果说对讖纬的禁锢有一定价值的话，那么对天文图书的禁锢简直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天文古籍保留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天文书的遭禁，为禁毁科技著作开了先河。古代的科技著作由于不受重视，导致相当部分散失亡佚，以致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时断时续，常常在同一水平上重复，而最终落后于西方。

宋代统治者吸取了秦始皇毁灭文化典籍的教训，借鉴了汉、唐的作法 and 经验，对禁书现象，经过一个扬弃的过程又有了更新意义上的回复。从“乌台诗案”开始，到两毁苏（轼）、黄（庭坚）文集案，中国历史上以当代名人著作为主要对象的禁书事件从此开场了。苏轼因常把对时政的不满融进那神采飞扬的作品中，被统治者冠以“包藏祸心”、“讪谤朝政”的罪名，系于御史台（别称“乌台”）受审。“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之一。在王安石变法派与司马光保守派的政治斗争中，苏轼既

反对新派变法，又不满意旧派全盘废除新法的做法。所以，他既得罪了新派，又失和于旧派，无论新、旧派谁来执政，他在政治上总是不得志。因政见不同而禁毁有关作者的著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无疑是一种专横的举动，为中华文明涂上了一道永远都难以抹去的阴影，及至明、清两代，血腥的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与政治的距离如此短暂，在劫难逃；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肆意诬陷、诽谤，这是封建制度下知识分子的悲剧。任何人的政见都将影响其作品的出版与流传，倘若要使自己的文字公之于世，就必须在政治上与政权保持高度一致。否则，苏、黄文集被禁毁的厄运便随时可能降临。

由于“因人废书”的阴影，宋代的文人大都生存在一种压抑的气息中。宋代的程朱理学盛极一时，就连如此正统的学说，在南宋曾一度被判为“伪学”。宋词中虽有“大江东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词，但总的基调却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寒蝉凄切”、“更与何人说”之类的哀婉之歌，这不能不说与宋人普遍的压抑心绪有关。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宋代出版不久就几乎被毁版。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除绘画本身的规律外，密匝的文网迫使文人士大夫缄口沉默，只好采取这么一条无声的渠道来发泄愤懑，吐胸中块垒。尽管文化有时会在高压政治下结出奇异的花朵，但这并不能反证高压政治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必要作料。

宋代的禁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宋天子们对文化的情有独钟分不开的。同那些文化素质低下、未谙文化控制奥秘的勇武君主不同，赵宋的皇帝们大都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喜欢舞文弄墨。太祖虽是一介武夫，晚年却酷爱读书；太宗曾建崇文院，下令编纂《太平御览》；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还能赋诗填词；理宗则十分推崇朱熹的《四书》注。由于他们重视书，读得懂书，很容易看出其中流露的对现实不满情绪，有时甚至神经过敏地把一个普通

问题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来处理。他们热心编书，是期望领风气之先，他们时常怀疑别人写书是跟他们唱对台戏；政见不和者的书就更难见天日了。历史的阴差阳错，有时令人感慨不已：如果徽宗赵佶只是一个画家，而不当皇帝，那么他出众的才华将比他一生干过的种种穷奢极侈之事更令人铭记。但命运偏偏让他坐了皇帝，不幸的是，赵佶文化修养和艺术才华的存在，便成为其他文人的文化成品（包括著作在内）无法继续存在的前提。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宋统治者对文化的高度戒备，动辄采用禁书的手段，诱使一些渴望飞黄腾达的文人逐渐养成一种靠检举他人私撰或收藏禁书来往上爬的风气。一些文人因长期受正统思想的熏陶而失去了做人的良知，在高压政治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惟有通过攻击同类才能保全自身。

文化发展的轨迹有时会像钟摆一样，从一端转向另一端。与宋代相比，元统治者未谙文化控制的奥秘。这个在大草原上纵横驰骋、剽悍骁勇的民族，在骨子里有着和汉族礼教文化风格迥异的建构文化的方式。他们轻视文人，疏于意念，喜欢随意行事，从客观上形成了禁书范围不大、措施不严的格局，导致了思想界的相对宽松与活跃。元初废除了科举考试，文人为官出仕的途径被堵塞，加上“九儒十丐”的低下地位，迫使文人走向勾栏瓦肆，与市井文艺结合。这在客观上为元代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重人性、轻说教的局面，元曲日益走向繁荣。令人诧异的是，元代以前的统治者视图书为洪水猛兽，屡禁书籍，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一重深过一重的灾难，甚至使文化停止不前或向后倒退。文明程度与禁书程度同步的现象，绝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元代宽松的文化环境，为文化的再度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对封建制度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明、清两代的统

治者不仅要铲除政治上的异己，而且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镇压。明、清两代统治者在禁书方面花费的精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其手段也更为严密、巧妙，更为残酷和血腥。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倾轧，残酷激烈，翻云覆雨，诡谲纷纭。明代由于方孝孺案而被处死的共 873 人，发配充军而死的更不计其数。被杀的士大夫的著作，不劳皇帝明令禁止，自然成为禁书，不得私下收藏。这便是禁书史上的新举措、新发明——不禁之禁。

如果说宋代的“乌台诗案”和“庆元伪学”之禁只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话，那么明代禁《剪灯新话》之类小说，逮捕李贽并焚毁其书籍，清代严禁《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等所谓“邪说传奇”、“淫词小说”，查禁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著作及以《苏报》案为中心禁邹容、章炳麟等人著作等，纯粹是对其所反映的思想的禁止与钳制。如果说宋王朝是希望以改头换面的儒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那么明、清两代则是把儒学的一个派别——程朱理学作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绳。由此可见，明、清的统治者的心胸比任何一个朝代都狭隘，其对文化的封锁与控制空前严酷。禁书，成了统治者桎梏人们精神世界的最有力的一种手段。

与严厉的禁书措施相配合，明、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文人、士大夫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野蛮摧残和血腥杀戮。高启仅为了一篇《上梁文》及一首《宫女图》的诗而惨遭斩首，这在自秦禁书以来是绝无仅有的；像对方孝孺那样灭其十族、满门抄斩，像对茅大芳那样把其女性家属送到教坊里当妓女，更是史无前例的；沉迷功名、热衷仕途的戴名世，只因在《南山集》中把清政府极力隐瞒的内幕揭了出来，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甚至于为戴名世的书作序的、出资为他刻书的都未能幸免；更令人发指的是，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因得到过戴名世的赞赏竟也成了逆书，早已死去的方孝标被刨棺戮尸，其子孙被发配黑龙江充军。

清代的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连疯子也不放过。愚偏执狂的丁文彬，自称小时曾在衍圣公（宋仁宗至和二年即1055年封孔子后裔为世袭衍圣公，后相沿不改）府中，并把自己书中原署的“丁子曰”改为“天子曰”，结果被处死，其哥哥、侄子们被判为斩监候。仅清高宗在位的60年中，较严重的文字狱就有30多起，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起。真可谓天威莫测！士大夫的生杀予夺、荣辱贵贱全系于君主的一念之差。

尽管清代的文字狱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但所能禁毁的书籍到底有限。倘若对已有著作公开进行审查，将一切不符合统治集团要求的都加以禁毁或删改，又未免显得过于露骨和凶狠。而在征集图书的幌子下，用长达16年的时间编纂、誊录《四库全书》，真可谓用心良苦了。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除通俗小说和戏曲外，包括了当时图书的所有门类，共收书3470种、79018卷。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现已成了孤本。从这一点讲，它对保存我国的文化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是，清政府借在全国征集图书之机，毁书2453种，抽毁书402种，被毁书籍的数目竟相当于《四库全书》的四分之三，被抽毁书籍的数目也接近于《四库全书》的八分之一，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自秦始皇焚书后，中国文化还从未遭受如此浩劫。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曾列举了被严重删改的书籍，说它令天下士子读后，“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可见，它给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埋下了精神怯懦的种子。这种损害是无法用数量来计算和衡量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对我国文化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恐怕是远远大于其贡献的。

明、清两朝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期间，也就是14世纪，正值西方文艺复兴的前期，在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打起“尊重人权，提倡科学”的大旗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